



高教信息参考

INFORMATION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发展规划处(教研中心) 编 2020 年第 04 期

本期导读

-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及其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内在逻辑
- 吴岩：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 杜玉波：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面临新挑战
- 笔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编者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阶段；是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代征程，为未来中长期发展起好步、开好局的关键阶段。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十四五”规划是承上启下的规划，是新的特殊时期的规划，是要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未来5至15年的高等教育发展擘画战略蓝图。高校“十四五”规划是面向未来三十年的开局规划，瞄准未来三十年教育发展的趋势，对于高校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期以“十四五”规划为主题，集中选刊若干文章，供大家学习交流，以期为我校“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提供政策指导与经验参考。

目 录

【政策解读】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及其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内在逻辑..... 1

【高教视点】

吴岩：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8

杜玉波：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11

孙其信：构建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农科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思考

.....17

王定华：世界格局变革下我国本科教育发展若干方略..... 20

【学术观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面临新挑战.....24

论大学二级院系的战略发展规划..... 28

【百家争鸣】

聚焦！高校“十四五”规划：识变、应变、聚变、求变..... 38

笔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42

【政策解读】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及其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谋划未来我国改革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会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将“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为国家未来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

编制“十四五”规划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历史关键节点上，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编制“十四五”规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战略安排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九大将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这 30 年分两个阶段来作出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议》全面总结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同时清晰展望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必将有力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编制“十四五”规划是统筹“两个大局”的现实需要。胸怀两个大局，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外部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从内部看，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迎来无比光明的前景，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建议》直面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为我们统筹“两个大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我国发展行稳致远指明了科学路径。

编制“十四五”规划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建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

编制“十四五”规划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按《建议》要求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能够充分发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政治稳定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十四五”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编制“十四五”规划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强劲动力。“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今年8月，“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网上征求意见，这在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历史上是第一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网上留言有100多万条。“十四五”规划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为社会各方面提供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有力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奋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具备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十三五”时期，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预计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100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16%，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稳步迈向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今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效，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将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重点领域投资持续较快增长。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53.9%。科技创新作用凸显，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脱贫攻坚成效举世瞩目。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和社保兜底脱贫等全面推进，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预计今年年底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可全部实现脱贫、未摘帽贫困县将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得到解决，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中国奇迹。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国土绿化行动有序开展，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形成。

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纵深推进，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

目标顺利实现。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若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产权保护法治体系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深化，市场化价格机制基本建立。财政金融等重点改革持续深化，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成效，金融等重要领域风险总体可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立，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推动多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义务教育有保障的目标基本实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6000 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生命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快普及，2019 年全国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99.4%。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16-2018 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4.8%。文化软实力日益凸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持续加强，依法治国实践得到深化。

“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是相互衔接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既立足近期，又谋划长远，二者相互衔接，为持续推进各项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是内在统一、协调一致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和正在制定九个五年规划（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立足于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实践，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战略安排。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奋斗进程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将长远战略目标分解为阶段性发展目标。“十四五”时期，要努力实现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 2035 年，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需要把长期与短期结合起来，体现历史的延续性和实践的新要求，既明确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又把握奋斗的手段是什么，还清楚奋斗的路径是什么，实现目标、手段与实现路径之间的内在统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是有机联系、接续推进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目标。为此，要落实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方面的重大任务。这将为到 2035 年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对外开放、居民收入、安全稳定、人民生活等九个方面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条件、打下基础。2035 年远景目标锚定了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为五年规划提供了明确对标的参照系。这要通过三个五年规划引导来逐步实现。“十四五”规划作为开局阶段的第一个规划，需要按照远景目标的指引不断推进各领域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强意志和不变决心，充分彰显了战略上的坚定不移、理论上的一脉相承、实践上的接续奋斗。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是孕育新机、可期未来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从国内来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面临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的机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面临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行，努力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变为发展现实。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好干部标准，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健全覆盖全面、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认识把握这两个大局的发展大势和基本特征，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宁吉喆，来源：人民论坛网，2020年12月21日）

【高教视点】

吴岩：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指明坐标方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战线的头等大事，必须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把全会精神切实贯彻落实到高等教育实际工作中。

一、构建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

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了全面提质创新的新的时代。有五大方面我们必须给予应答。

一是在教育发展中明确工作的新方位。

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教育将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进入了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必须由如何做大转向如何做强，必须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从理念、目标、政策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

二是在教育工作中落实新发展理念。

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创新是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协调要求各级教育上下衔接、各类教育左右沟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绿色是要按教育规律办学、按教学规律育人，让教育教学可持续发展；开放是中国教育由做大走向做强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国教育自信的重要体现；共享是通过全方位、深层次的供给实现更高质量的公平。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工程，教育必须全面发挥好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率先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教育功能上发挥好服务、支撑和引领作用。

“小逻辑”服从“大逻辑”，教育自身发展要服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把教育作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先要素和内生变量，放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划，放到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中思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面向文化大繁荣，发挥教育的先导作用，支撑引领文化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建设。

四是在教育改革中突出系统化思维。

注重由要素发展观转向整体发展观，从发展模式、体制机制、结构类型、评价方式、内在活力、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教育体系进行整体性流程再造、机制塑造和文化打造，以高质量统领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实现规模足够大、结构足够优、体制足够活、类型足够全、质量足够高、效益足够好。

五是在体系建设中覆盖全学段、着眼大教育。

从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增强国民素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度，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全面研究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新教育形态等不同学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是这次全会作出的重要判断。要在新起点上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着力抓好“四个质量”，推动高校树立质量意识，掀起质量革命，建成质量文化。

一是抓根本质量。

立德树人成效是衡量高校工作的根本标准。教育的高质量，核心是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从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到今年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和即将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人才培养“连续剧”接续全面展开。但我们必须看到，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仍不够牢靠。必须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人才培养作为高校的核心工作，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系统化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二是抓整体质量。

整体质量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标志。目前，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问题和短板仍突出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资源配置不均特别是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资源比较集中，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多样化发展不充分，急需建设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体系。要围绕“四点一线一面”战略布局，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保障中西部经济振兴、文化振兴、教育振兴、人才振兴和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主动适应科技与产业发展需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划分和结构。

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推动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培育特色优势专业集群，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

三是抓成熟质量。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改革发展已经开始进入深水区，部分领域开始进入无人区，如果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引就会迷失方向。必须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研究，特别是把握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加快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决不能“身子”进入普及化，“脑子”还在大众化，“习惯”还在精英化。同时，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建强高效富有活力的治理体系，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推进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

四是抓服务质量。

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水平不够高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抓服务质量就是要发挥好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推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发挥高等教育“集聚—溢出效应”，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等，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战略的能力，助力提升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8日第1版）

杜玉波：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中国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发展新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

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环境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与国家战略需要同频共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反复强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迫切需要。当前，我们要置身新发展格局，深刻思考和回答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之问。

在人才培养的方向上，要毫不动摇。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都有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是教育的价值和责任。我国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始终站稳这样的立场，树牢这样的观点，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着力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中坚力量，这对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在人才培养的地位上，要持续巩固。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和功能，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培养人才。看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不是看一时的规模、数据，而是要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看它培养出什么样的杰出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我国高校应更加强化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将更多精力聚焦到提高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上，切实保障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培养勇于为党分忧、为国担当、为民族复兴担负责任的时代新人。

在人才培养的路径上，要尊重规律。人的培养过程带有普遍的规律性，遵循规律则事半功倍，违背规律则事倍功半。办好高等教育，要遵循人的成长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加强学科、教学、教材、管理体系的统筹规划和设计，推动教学内容和方法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把知识传授、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到价值引领融为一体，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 优化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教育布局结构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对任何一个强国而言,高等教育布局结构都有一个战略考量。上世纪 70 年代,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6%,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区域城乡、学科层次等方面依旧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且成为制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该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形成大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也是同样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

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关键在缩小差距。高等教育要适应新发展格局,既需要东部发达地区的率先引领,又需要中西部地区的迎头赶上,还需要各地方高校的创新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政策资源、财政资源、人才资源的供给不平衡,造成高校空间布局上的不合理,呈现东部资源密集、中西部稀疏的“东高西低”格局。当前,要在政策引导、资源投入上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高校倾斜,加快实施新一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依托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促进高校主动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关键在以特求强。学科专业建设应坚持有选择性的发展,要小而精,不要大而全。但不少高校仍热衷追求所谓“综合性”“全科式”发展,存在资源分散、只见“高原”不见“高峰”的问题。要坚持把社会需求作为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的重要因素,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学科专业建设的底线要求,建设好一批能够支撑国家急需、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学科专业布局。

建设分类办学体系,关键在错位发展。我国高校的类型层次应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形成梯度、对接需求,实现差异化发展。多年来,我国相当数量高校存在办学同质化现象,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解决这一问题,要针对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办学特点和

区域需求，加快形成分类评价的体系标准和管理政策，构建起与我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体系，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环境下，从同型竞争走向错位发展。

三、提升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创新服务能力

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大学，首先属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它要以满足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为己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和长期战略，不是被动应对和权宜之计。当前，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仍然突出。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应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在服务支撑国家人才需要和创新需求等方面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当主力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然要以中国高等教育的升级版为基石。高校要通过调结构、搭平台、创载体、建机制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在区域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要把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校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全面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

强化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是技术研发的源头活水。夯实基础研究，才能为科技实力的持续增长备足后劲。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東西没有搞清楚。高校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板凳甘坐十年冷”且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占领制高点。高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创新人才聚集等优势，应当在服务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方面担当重要责任。面对国家战略需求，高校要进一步研究破解政策制度障碍，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探索开展跨学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协同创新，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需求。

四、 形成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教育评价机制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的难题。教育评价既有国际公认的标准，也有适合本国实践的特色体系。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是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愿景，必须多措并举、全面发力，探索形成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教育评价机制。

注重理念革新，思想先导。科学理念是正确实践的思想先导。各级各类学校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观，将立德树人摆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围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构建学生评价体系。要着力破除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和做法，对学校不再简单以升学率来评价，对教师不再简单以考分排名来评价，对学生不再简单以考试成绩来评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用人不再简单“唯名校”“唯学历”是举。

注重破立结合，以立促破。要从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在唯与不唯之间找到平衡，搞清楚从哪里突破、规则是什么、路径是什么。比如，破除“唯分数”方面，破的是将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立的是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回归育人本质；破除“唯论文”方面，破的是把论文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发展晋升的核心指标，立的是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注重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构建新的教育评价机制，需要运用整体思维，协同发力，系统推进。具体来讲，就是要认真践行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导向，改进结果评价，扭转功利导向；强化过程评价，尊重客观规律；探索增值评价，挖掘发展潜能；健全综合评价，力避片面倾向。

五、 完善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大学治理结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要构建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职能部门和专业院系为依托，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不断释放办学活力，激发办学动力，推进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办学方向。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根本制度，党委领导重在谋划和决策，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职责，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校长负责重在实施和管理，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

工作，依法行使职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使学校发展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谋划、与党的组织同步设置、与党的工作同步开展。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落实立德树人。坚持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理念，构建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相统一、校内教育和校外培养相协同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坚持融合贯通，建立既与中小学德育相衔接，又真正适合大学生成长特点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坚持系统思维，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之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坚持统筹兼顾，实现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形成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汇聚办学合力。要加快推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基本框架，充分发挥学校各职能部门联动的工作优势，形成高效、协调、顺畅的运行机制。要注重激发院系“中场发动机”的作用，把党的教育方针和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到院系的各项工作中来。要把学校的学术组织和群团组织作用发挥好，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相对分离，又相互促进，形成相得益彰的良好工作机制。

六、开拓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开放合作局面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优化教育开放全球布局，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层次和水平。”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正面临着“发展中的挑战”“打压中的突破”“开放中的博弈”等复杂局面，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新压力新挑战。应顺势而为、应时而动，统筹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和教育交流合作，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合作局面，提升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

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合力解题”。扎根中国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根本原则和立场，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实际，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融通中外是对外开放的内在逻辑和方向，要求我们必须面向世界，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内薄弱、空白、紧缺学科专业，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技联合攻关，汇聚全球资源和天下英才“合力解题”，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姿态应对全球共同威胁

和挑战。

坚持有选择的“请进来”、有章法的“走出去”、有目标的“深参与”。一方面，面向全球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强化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提升人才培养力。另一方面，争取与国外高等教育多对话、多来往，有进有出、相得益彰，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扩大对外影响力。特别要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治理，深度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评价标准、规则等的制定，在教育合作中提升国家形象，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深化国际融合力。

坚持开放共享与合作共赢，营造发展新格局。这次疫情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要秉持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姿态，体现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使命、格局与担当精神，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建立起健康的可持续性合作关系，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就。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站，2020年11月23日）

<https://www.cahe.edu.cn/site/content/13730.html>

孙其信：构建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农科高等教育

治理体系思考

一、新发展阶段下农科高等教育新挑战和新要求

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必然对整个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也不例外，高等农业教育更不例外。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两个大变局，也催生了新发展格局和推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党中央历来把农业农村工作作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安排部署和推动落实。在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农业依然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重大的任务。虽然农业的 GDP 只占到我国 GDP 总量的 7%，也就是 7 万亿左右，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以农业和农产品带动的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工业的总产值。此外，我们还要完成全面乡村振兴、推进新农村建设等重要任务。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充分肯定了高等农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并对新时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就是高等农业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在肯定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面对巨大的挑战。新时代，为了适应新发展格局，高等农业教育必须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和改革方法，农科高等院校治理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农科高等院校的发展历程与新发展理念

自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战略部署以来，高等农业教育始终紧跟国家战略步伐不断前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在变，教育也必须要变，这是我们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如果一味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将很可能被瞬息万变的世界所淘汰。在这种挑战下，高等农业教育必须要识变、思变、应变，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人才的需求、科技的需求、文化的需求。从大学治理上来看，涉及学校内部治理的变化以及学校之外治理的变化两方面。内部治理的变化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重构发

展，学科交叉发展是重大的方向。从外部来说，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是一个必然趋势，必须要考虑国际国内双循环新背景下，新型的大学发展之路也必然是未来需要改革的重大的方向。高等农业教育要在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格局下谋变，也必须要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下思变。

三、农科高等院校需要着力构建的新发展格局

首先，要发展一种互为依存、和谐共生的学科生态系统新格局。由于面临的任务在变，所以大学核心骨架、学科体系必须要适应变化。未来的农科建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一、二、三产融合，农业与环境、农业与健康综合交叉不断创新发展的学科体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建设一套适应国际学科前沿、适应国家发展潮流的新型的学科布局，特别是谋划新型需求的学科布局，这也是构建发展格局里面要考虑的重大命题。近几年，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大”）围绕国家需求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的交叉研究院、新型发展研究院，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视野下的农业高等教育和食物、营养、健康的研究平台和发展平台。

其次，要构建一个顶天立地、知识融通的人力资源新格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跨越都是依靠人力资源才能实现发展，在新时代新背景下，推进以顶天立地和知识融通为导向的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重大使命和任务。农大在过去一段时间建立了新的发展格局和人力资源的评价和发展体系，应该说在新型的人力资源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同时，结合评价体系的改革，建立了破立并举的新型评价体系来适应新时代、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提升学校发展的动能。

第三，要构建独立自主强农兴农的科技创新的新格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伟大历史使命，对科技的强烈需求将会史无前例。大学作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必须在布局谋划支撑农业现代化的科技上迈出步伐。

农大在对标国家重大需求方面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已连续十多年来在吉林省梨树县开展了黑土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多学科攻关。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要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在全国推广中国农业大学建立的梨树模式。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双一流”建设中，农大聚集了多学科数十个教授团队开展连续攻关，在黑土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创出一条具有农大特色的科学道路。

最后一点，要构建良性互动、合力增效的校院治理新格局。前面各位专家关于内部治理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基本导向是要激发活力、提升效率，这方面农大也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我体会，大力度的改革是必须的，与此同时“小切口”模式的改革可能是更直接的，更能快速见到成效。过去几年，农大陆续推出了60余项小切口改革，通过小改革产生了大效益。这种改革模式符合学校发展现状，也符合在相对稳定的宏观体制下深化改革、大胆改革、精准改革的更高要求。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不断改革，才能进一步焕发机制体制的活力。**在构建高校、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方面**，很多学校都做得非常好。最近，学校在全国各地积极谋划中国农业大学的系统布局，这也符合新发展治理格局的需要。此外，要构建符合国际化潮流的全球农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流新格局，能够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传播中国范式。中国农业大学在联合国合作委员会的框架下代表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脱贫经验的政府报告，向全世界宣传介绍了中国成绩，发出了中国声音。

（作者：孙其信，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站，2020年11月23日）

王定华：世界格局变革下我国本科教育发展若干方略

当人类社会即将步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新一轮科技革命加深加广，人工智能扑面而来，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对于各国高等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这些变化，我国的高等本科教育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度开放合作，培养全球胜任力，打造国际化课程，拥抱人工智能，完善保障机制，正确处理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关系。

一、世界格局变革下本科教育的定位

定位受形势影响、受规律影响、受使命影响，就外部的形势和使命来看：

一是新冠疫情影响全球

2020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领域之深历史罕见，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的威胁，对世界格局和世界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给全球各行各业带来巨大挑战。教育置身其间，影响十分明显。首先，新冠肺炎疫情使高等教育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其次，新冠疫情对全球学术就业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再次，新冠疫情对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严峻挑战。我们现在还仍然经历着疫情的过程，我们需要主动应对、化危为机。

二是“一带一路”全面推进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形成了丰富的合作成果，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期间既孕育着重大的机遇，也伴随着巨大的挑战，使得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更加凸显。首先，“一带一路”的推进迫切需要加快外语能力的建设，只有语言相通、文化相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当中，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至关重要，同时非通用语的战略支点作用也日益显现。目前“一带一路”国家有 64 个，由于它是开放性的倡议，加入的国家还会更多。对于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要有直接的了解、直接的掌握，这些非常重要。对于新时代的大学来讲，如果你说仅仅懂英语，那我认为远远不够的。

其次，“一带一路”的推进迫切需要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不同的类型的本科院校，或者

是不同层次院校的本科教育阶段，都应该主动对接国家需求，瞭望世界发展大势，对照国际行业标准，从本校实际出发，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致力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再次，“一带一路”的推进迫切需要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归根结底是文化的交融，只有更多地促进文化上的彼此理解、融合，才能进一步在合作的内涵方面真正产生化学反应，进而让彼此共同成长。

三是世界科技迅猛发展

大学在这种科技的变革中也正在发生变化。首先，大学的物理围墙逐渐消失。其次，大学的知识权威面临威胁。再次，大学的学科专业遭遇挑战。

四是我国政府高位部署

对于本科教育，党和国家非常的重视。进入新时代，面向现代化，上级对于这种本科的改革和发展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对于本科教育更加强调，对国际化人才也更加重视。特别是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摆在重要的位置，提出要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以应对这种国际格局变化的新形势。

二、世界格局变革下本科教育的措施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

当前双一流建设加快推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种思想、思潮相互交融、交流、碰撞，各种评比排名也是名目繁多，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我们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首先，保持战略定力就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其次，保持战略定力需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再次，保持战略定力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平心静气、冷静观察。特别是中美的一些摩擦，让我们都非常的担忧，但是高等学校要坚定信心、积极应对、辩证看待、稳妥把握，不管政治、经济关系如何变化，都要始终保持自信和定力，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

二是深度开放合作

要立足内外资源创条件，要实施出国交流广覆盖。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由学校出钱帮助每一个学生有一次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要参与全球治理占高地。

三是培养全球胜任力

为此，在本科教育阶段要努力做到英语开道、复语跟进。要立足国情，全球视野。要加强通史教育，全面发展。

四是打造国际化课程

要突出专业的外向性，要提升课堂的互动性，要体现教材的融通性。

五是拥抱人工智能

以人机协同改革教学范式，以人工智能促进学科融合，以共享共享拓展办学资源。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我亲任这个实验室的理事长，就是要探索语言学习的生理机制和在高科技条件下帮助青少年学习外语的便捷途径，真正解决广大中小學生、大学生学习外语耗时过多、效果过差的问题。

六是完善保障措施

首先是优先安排本科教育，其次是科学评价教师绩效，再次是全力支持教学一线。

三、世界格局变革下本科教育发展的统筹

一是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格局如何变化，高等教育的关键部分是本科教育，没有优秀的本科生培养质量，研究生教育就没有高质量的毛坯和种子，就无法保证培养出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同样，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对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机制完善、学术氛围的营造，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均具有重点促进作用。当然高等学校是分层分类的，应该办出特色，不宜一个模式。

二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始终也没有处理好。我想本科教育阶段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很重要，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本科教学关乎国

家发展和安全，既是现代大学的初衷，也是现代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注重本科教学，注重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明确要求。所以，高等学校教师无论名气有多大，教师是第一身份，上课是第一责任。同时，没有科研的教学是低水平的教学，重复性的教学，要用科研反哺教学，坚持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形成师生共同科研的良好局面。

三是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

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应该一视同仁，共同编班，共同上课，共同住宿，相互交流，针对特色，因材施教，各展所长。

四是教育传统与教育变革

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继往开来，要把我们本科教育好的传统予以总结、弘扬和坚持，同时要把外校、外国好的做法进行充分的汲取。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也正走向中国，让我们在这种地球村的环境中相互学习，携手共建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学术观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校学科建设面临新挑战

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对高校学科建设提出新要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创新驱动的新兴产业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引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全球创新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期，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使得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持续广泛应用渗透，催生了电子商务、“网约车”等一批新业态，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已经由中期阶段进入后期阶段，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长、第二产业占比进一步下降。在此期间，我国普通高校各学科门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工学门类高层次人才培养一直占据主体地位。以2018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为例，我国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的需求比重会进一步降低，专业型学位研究生的需求比重会进一步扩大；工学门类研究生的需求比重会进一步下降，教育、医学、健康、经济、管理等研究生的需求比重会进一步扩大。从国际比较来看，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欧美发达国家专业型学位研究生占比远远高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一般也高于理工类硕士研究生。我国高等学校要主动对接新经济、新业态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大力促进知识的生产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高校现有学科建设范式与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比对探索

新经济、新业态对高校学科建设范式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我国当前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制度变革需求也需要作出改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有学科划分难以适应全面发展人才培养需要。学科作为“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分类”，它是一种范式，主要目的为方便教学。学科的划分具有共同的基础知识和工作范式，同时又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以我国研究生学科目录为例，

其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三个层级，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而研究生学科目录通过四次调整后逐步得到完善，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学科内涵属性还未明显、设置口径较窄、难以充分体现学科的交叉融合等问题，难以利于高校培养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现有学科组织模式制约了多学科协同创新。学科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建制是大学产生的基础。大学里首先有了学科，然后再有专业，系和学院。而一个院系不仅仅只代表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管理规制可以在一个院系，但其内涵可以分属在不同的院系。尽管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和学院里，学科框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自 20 世纪以来，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解决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各方的关注，政府和大学均日益重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美国著名大学的学院设置数量普遍较少，大多为 5 至 10 个学院，最大的公立大学也不会超过 20 个学院，但是各类跨院系或学科的学术组织却非常多。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着院系设置较多、院系设置缺少层次等现象，如清华大学设有 20 个学院和 3 个独立的系，南京大学设有 28 个学院和 3 个独立的系，上海交通大学设有 30 个学院和 1 个独立的系。这些设置导致学科割裂较为严重，难以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动对一些多学科问题进行协同攻关，而且容易造成学科之间的攀比和竞争。

现有学科评价机制难以促进知识生产

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分类体系，有诸多的类别和分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范式，研究对象的特点、知识演进的逻辑体系、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等也各不相同。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使命和功能，它们的历史经纬、发展方向与优化路径也不尽相同。学科特点的多样性呼唤高校学科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价机制，包括对教师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评价指标。要坚决清理和破除“五唯”顽瘴痼疾，避免学科使用单一化的价值评判取向。当代科学发展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学科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综合集成发展趋势明显。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认为，当今社会知识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之外，正在浮现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影响十分广泛，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知识如何生产，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显著转移，知识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识组织的方式、知识奖励体制，知识的质量监控机制等等。”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需要新的评价方式，理应更加关注质量、影响和贡献，这对传统的学科评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摒弃基于学科的，以论文、著作、课题数“论英雄”的价值取向，会极大阻碍知识的生产和创新。

探索建立适应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的学科建设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高校必须对学科建设改革与发展模式做出相应调整，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构建多元学科评价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与我国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相适应的学科制度体系。

一要加快完善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学科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知识在不断产生，并不断重新条理化，一些成熟的学科和学科方向面临调整更新，一些新的学科和学科方向则开始生长形成。因此，不要过于固定地看待一个学科。以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2010 年最新修订的美国学科专业目录为例，因为考虑到学科关系的复杂性和学科划分的人为性等因素，美国学科专业目录在编制之初便提出其目的是：准确归纳和统计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实际情况，而非指导和规范高校的人才培养项目（学科专业）设置。相较而言，我国现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过于刚性，除了用于教育分类统计外，更倾向于指导和规范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工作。政府层面要在进一步增强现有研究生、本科学科专业目录衔接性，提升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综合度等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高校依据其对新的人才热点和亟需的准确把握，突破既有学科目录约束，根据行业领域特征自主设置人才培养学科专业。政府主管部门需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的力度，让更多高校能够拥有和行使学科设置自主权。

二要适时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学科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的载体，大学学科获得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必须能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大学不再是“象牙塔”。大学不仅要适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是要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这要求大学必须坚持需求导向，与国家“五位一体”建设、“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靠紧贴实，通过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拓展服务能力，提升贡献力，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构建综合化的学科体系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需要，是科学高度综合发展的要求，是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当然，学科的综合化并不等于学科门类齐全，而是要根据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结合大学实际，有选择地优化学科布局。大学一方面要调整好学科存量，根据新经济、新产业发展需求及时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传统学科行改造，拓展延伸传统学科的内涵，促进传统学科的升级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钢铁、石化、轻工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做优学科增量，结合国际科研

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积极设置与战略新兴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领域密切相关的学科，尤其是大力发展和建设新工科，构建起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学校办学水平和特色相一致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科体系。

三要不断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学科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学科组织作为载体，没有一定的学科组织或者学科组织设置的不合理，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国外著名大学的学院设置层次和职责均较为分明，主要基于教学和人才培养而设置，一般分为负责本科生教学和基础研究的基础学院以及从事研究生培养和应用研究的专业学院两个层次。此外，大学层面设置各类跨院系或学科学术组织的职责分工也比较明确，大多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进行设置，主要为科学研究服务，同时兼顾人才培养，对人员实行联合聘任或集群聘任，问题一旦解决机构随之撤销，所聘任人员回归到原来院系。我们看到，近年来的重大科研发现都是在交叉学科领域获得的。大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学科与院系的关系，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院系设置，提高院系内学科设置的综合性，促进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打破学科界限，突破院系壁垒，积极培育各类跨学科学术组织，鼓励师生从事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大力促进新知识的生产和跨学科人才培养。

四要建立健全学科多元评价机制。学科具有教学科目、学问分支和学术组织等多重含义，但从实质上看，学科是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包含了职业化的学者、相对固定的教席、共同的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文化和范式，绝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学科。对于一个学科学者，应重在衡量其对学科的贡献或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当今学科的高度分化与综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不仅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对学科建设与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大学学科建设管理模式改革的配合。大学的学科发展首先要从学科评价、学术评价变革入手，形成多样化的学科评价机制和体系，形成不同版本、不同价值导向的“学术榜”。尤其要探索适合于跨学科、超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激励、评价机制，构建学术同行和非学术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评价模式。大学要营造一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让不同学科都能找到自己发展、生长的空间，同时也使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成为可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对知识生产以及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0年第5期，作者朱永东，华南理工大学发展战略与规划处副处长）

论大学二级院系的战略发展规划

制定二级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是建立新型校院关系、实现院系自主办学的可行路径。二级院系作为大学的基层组织单位和重要办学主体，是大学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大学整体办学质量的高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双一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等重大改革任务的推进都离不开院系的底部支撑，都需要激发院系的办学活力。以往高等教育对战略发展规划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对二级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关照不够。重视二级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对于提高大学治理能力和院系自身的办学水平而言，可谓适当其时、尤为重要。

一、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必要性

什么是院系战略发展规划？从战略规划的性质来看，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具有战略规划的一般属性。战略规划是对大学发展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设计，是基于大学现实状态而进行的面向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状态的设想。在此意义上，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就是通过对外部环境、内部资源与能力的分析，确立院系的愿景、使命与长短期发展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战略选择，制定发展规划的过程。当前，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挑战、学校战略发展规划短板以及院系自身发展需求的回应。

（一）迎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挑战

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一大初衷是应对现代“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治理问题。乔治·凯勒将“外向性”定为战略规划的特征，强调学校着眼于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协调一致 [3] (P194)。现代大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大学如何更迅速地抓住和利用新的机遇，更准确地预估发展中的可能困难，通过整体发展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保持互联互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由此，现代大学表现出多元化巨型大学的风貌，不再是“居住僧侣的村庄”，而成为了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规模更加庞大、目标更加混合、权力更加分散、利益相关者更加多元。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出现对于学校治理，特别是校院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战略规划方面，大学既要坚持学校组织使命高于一切的原则，又要根据院系自身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授权，因院制宜，推动院系自主发展、追求卓越。在此背景下，院系层面的战略发展规划为实现校院协同治理提供了抓手和方向。

对于我国而言，健全基层单位自主办学制度是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必要的制度架

构。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这意味着我国很快就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门槛。普及化高等教育所倡导的个性化教育应当以院系为基础。扩大院系办学自主权，调动院系办学的积极性是普及化高等教育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有益于整合全校教育资源，在授权的基础上，改变二级院系在学校管理中仅仅扮演上传下达角色的窘境，使其真正承担起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体责任。

（二）补齐学校战略发展规划的短板

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大学管理者的共识。但是，中国大学的战略发展规划多发生在校级层面。校级层面的战略规划往往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规划的目标侧重以学校为整体的宏观性、方向性；二是规划的主体多以学校规划部门为主；三是规划的思路多依循自上而下的思路；四是规划的实施多以“包干到户”的形式将任务派发给二级院系。

如果仅仅停留于校级层面的战略发展规划，学校面临的重大风险在于战略一直处于“上浮”而无法“下沉”的状态。虽然校级战略规划与院系战略规划所处的层次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由于学校在办学资源和管理权上占有绝对优势，院系在学校战略规划的版图中时常处于尴尬的境地。我国大学大多数院系的发展经常是随着学校的政策、任务和检查走，学校要求怎么做，院系负责执行，其职能被简化为学校行政工作上传下达的中间人，简单定位于完成专业基本教学任务的“生产车间”。在战略规划方面，校级规划往往对院系具体的发展要务涉及不多；规划制定过程中征求院系的意见往往停留于少数的院系领导和教师代表；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教师，对于院系资源的分配方向、即将发生变革的方向、为什么要进行这些变革等重大问题往往一头雾水。这一方面导致学校的发展规划停留在文本层面，大大增加了实施的成本，以至于“规划”被讥讽为“鬼话”，相应地，院系依旧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耽溺于无目标发展、指令发展、模糊发展和紊乱发展的状态。因此，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有助于改变管理部门过度的行政指挥，反映院系自主发展的诉求，同时达到配合学校推进和落实校级层面战略发展规划的效果。

（三）激发院系办学活力的需求

大学综合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新型的校院关系，学校通过授权于院系，实现管理中心下沉，推进以院系为主体的改革。然而通过实践观察，学校授权之后，院系对自身“用什么权”

以及“如何用权”缺乏相应的规划。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最直接的动因在于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院系发展战略规划能帮助院系在持续的资源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使资源的获得快于资源的损耗，并对院系可能遇到的问题预先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完成学院的发展目标”。重视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既是由大学组织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反映院系在核心要务上以规划求发展的迫切需求。

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一大特点是“底部沉重”。院系既是学科与事业的矩阵组织结构的交汇点，也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结构的交汇点。院系在大学组织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承上启下、顾内视外的作用：向上要对接学校的发展战略和职能部门的政策，向下联系着以学科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内要担负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责任，对外要拓展办学资源、提供社会服务。“学校内部的各学术组织作为高校的组成部分有义务分担高校必须对外部环境作出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学术组织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特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直接与外部及内部各相关部门、各分支机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院系身具如此复杂的组织特点，承担如此重要的组织职能，如果没有战略思维的指导，没有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很难自下而上地保证学校的战略思想能从上层贯彻到各个院系。

一流学院是一流学科的土地，是一流本科教育的花园，战略发展规划起到培土、育苗的作用。绝大部分的二级院系是依据学科知识分类进行建制的，院系是学科建设的平台。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编制院系规划，建设一流学科、产出一流成果、汇聚一流人才、培养一流学生是院系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院系是实施教育教学的育人平台，直接影响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需要将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纳入战略发展规划的视野。院系汇聚了承担教育教学任务的师资队伍，囊括了教研室、课程组、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是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制定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有助于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统整师资、专业、课程等资源，提高人才培养的供给能力。概言之，院系要加快自身发展，不能仅仅靠个别突出的教师，不能仅仅靠运气，只有进行全面的规划设计，才有可能办得更好。

二、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原则

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属于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s)而非运营计划(operational plans)。战略计划是应用于院系整体的组织的计划，周期较长，相对抽象，其任务在于建立院系的全局目

标和寻求在内外部环境中的定位。而运营计划更多地是指院系常规工作计划，周期较短，相对具体，提供实际的工作安排和行动方案。基于此定位，院系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若干原则。

（一）协同性原则

协同性原则强调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要处理好与学校战略规划的纵向关联，实现与职能部门专项规划的横向互动。从纵向关联看，院系战略规划隶属于学校发展战略。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将院系发展、学科专业建设、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置于学校发展大局中加以考量，学校发展方向、基本指导思想是研制工作的重点。院系战略发展规划要依循学校的战略思想，应与学校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才能保证学校整体发展方向基本趋于一致，避免一盘散沙的情况。以伊利诺伊大学为例，该校的战略规划分三步来推进：第一步是制定总体战略规划；第二步是各个分校和支持机构的跟进；第三步是细化分校的学院、系和主要管理单位的规划，并力求保持三个阶段在总体目标上的一致畅通。而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的设计也必须依据院系的实际发展水平，才能如实反映院系的发展需求和战略重点。可以说，学校战略发展规划和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关系就如同一列“动车组列车”，前者是车头，后者是自带动力的车厢，二者共力驶向理想的目的地。从横向互动看，为了推进学校战略发展规划，各个职能部门也会配套相应的专项规划，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应与之保持同频共振，避免在规划的旗号下各自为政、貌合神离。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着各级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程度。大学职能部门汇聚着相关的专项资源并在一定权限内进行校内分配，院系的发展离不开这些资源的支持。同时，专项规划更多地考虑近期的工作重点，覆盖的周期较短，与院系战略发展规划中的近期目标较为同步。因此，院系在确定近期目标时也需要考虑与职能部门专项计划相匹配。

（二）统领性原则

统领性原则强调院系战略发展规划要“统”全局，要“领”长远，聚焦于院系整体的发展思路和在可预期未来内的行动路线。“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院系战略规划必须回答三个重要的命题：我们现在何处？我们想要往哪里发展？我们如何到达目的地？对于这三个命题的回答，院系应当从全局的高度、长远的站位来思考和探索。院系战略发展规划不是对日常工作事项的安排，其本质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环境中，院系积极主动寻求变革，通过唤醒使命、改变资源配置和内部行为来提升应对变革的能力。因

此，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更关注影响院系整体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非具体工作问题。同时，院系战略规划是“望远镜”而不是“放大镜”，更加强调院系长期的发展愿景和行进方向，更加强调院系作为一个组织如何与环境相结合、如何实现预期目标的路径。“没有战略的组织会像没有舵的船，在原地打转。它又如同一个流浪汉，漫无目的，无处可去”。相反，院系如果能放眼全局、立足长远，找准影响自身全局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问题，清楚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发展机遇，克服困难，发展轨道就能从“羊肠小道”升级为“高速公路”。

（三）优序性原则

优序性原则强调院系战略发展规划要谋划战略重点，抓住影响院系发展的重大问题、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确认优先顺序，进行重点设计。院系战略发展规划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不确定性，二是资源有限。当前院系(特别是二级学院)的整体规模越来越庞大，事务越来越庞乱，来自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庞杂。在多变复杂的环境中，院系发展如何在变化中保持定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对院系应对变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学科专业水平的提升为核心，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以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为重点，是院系发展绕不过的主题。牢牢围绕这些主题制定战略发展规划，重点突破，有所取舍，才能确保战略发展规划的思路更加明晰，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对于任何院系来说，资源总是有限的，战略发展规划要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院系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时，要将短板理论和长板理论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院系资源配置一方面要补齐基础办学的关键短板，一方面要延长特色办学的长板，以规划孕育特色，以特色造就优势，以优势提高水平，通过集中有限资源打造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另外，不同院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战略重点，如在创业期，院系战略重点在建基立业、建章立制；在中兴期重点在于充实内涵、培育特色；而成熟期，重点在于常规办学、卓越贡献。因此，制定院系战略规划要向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四）民主性原则

民主性原则强调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确保以教师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的全程参与、全员参与。首先，鼓励教师参与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是与组织成员的构成

特点相适应的。有研究者指出，大学管理比企业管理更令人满意，同样也更困难，其原因在于组织成员是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动机更多来自于工作本身内在的吸引力，而非简单依据行政管理人员的指令行事。体现教师民主参与的战略发展规划，有益于形成一个广泛接受的行动规划，增加教师的组织认同，使共同体朝着共同认可的目标前进。同时，教师的参与能提高战略发展规划的质量，提升组织成员对于战略规划的认同。院系战略发展规划不仅是组织发展的蓝图，也与院系内部每一位成员的个人发展息息相关。高质量的战略规划能真实反映教师的声音和诉求，并在组织使命和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教师的参与能使战略规划成为院系不同利益群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使战略目标转化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愿景，使战略规划落实为不同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通过敏锐的分析和参与式讨论，每一个教师和管理人员都能为未来竞争制定富有想像力的学术战略，并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通过协同工作、运用新的管理手段和更自觉的战略规划，学者和管理者就能带领学院顺利闯过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难关”。因此，院系战略规划的民主性原则体现了教师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体现了“群体定制”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参与的特点。

三、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路径

中国式的战略发展规划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典型特征。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就是要协调院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方向性的关系，要协调院系发展的内外环境与组织发展的关系。从路径上看，如何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管理学将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流程大致分为确定组织使命和愿景、内外部分析、战略构造、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等步骤。而已有大学战略发展规划的实践多依循管理学的观点，结合组织特点加以改造，多从学校发展态势、发展愿景、发展目标、重大行动、机制保障等方面着力。制定院系战略发展规划需要复杂性的战略思维，而非直线思维方式。院系可以把战略承诺(strategic commitment)、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和战略行动(strategic action)作为制定战略规划描述的基本路径。

(一) 战略承诺

院系战略承诺是院系坚守的使命和愿景(至少 10 年以上)，要解决的是“要不要过河”或者“过哪一条河”的长远目标问题。院系战略承诺是依靠价值驱动的，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院系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是出于组织应变、求变的需求，院系必

须具有明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才能凝聚共同体成员的共识，解决认识分歧，心往一处聚，力往一处使。在树立院系核心价值理念的过程中，院系要发动全体教职员对办学历史、办学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积极主动思考自身的发展问题，谋划未来的发展。在战略承诺方面，院系战略发展规划还要回答“我们想要成为什么”的问题。在学校发展的蓝图中，我们能否找到自己的坐标？在学科发展的体系中，我们应该落位在哪个位置？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布局中，我们能做出哪些贡献？这些事关院系发展定位问题的答案不是空想出来的，需要系统分析院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研究院系服务能力与地方发展需求的呼应，诊断院系所处发展状态和发展阶段之后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回答。院系必须描绘“河岸对面的风光”，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对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做出长远的承诺，且以发展愿景的方式将战略承诺在院系内外进行广泛传播，寻求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了解、支持、合作和监督，从而达到价值认同，最终实现战略发展规划的统领性、稳定性。概言之，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应该呈现长期和宏观战略的可持续性和一致性，呈现出院系长远的价值追求和坚定的战略承诺，帮助共同体成员在发展前行的途中无论遭遇何种的困难和诱惑，都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二） 战略计划

战略计划是院系选定的重点发展方向(一般至少 5 年)，主要解决“先摸哪几块石头”的中期发展目标问题。与战略承诺相比，战略计划由于时间跨度较小，院系可以基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理性分析，对实现战略承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作出科学选择。这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包括凝炼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发展一流本科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内容。院系在确认战略发展计划的过程中，经常采用 SWOT 分析法、标杆法作为战略决策工具。院系运用 SWOT 的分析法，可以用来评估影响院系发展的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从而通过矩阵分析，确定战略类型和发展重点以利用组织优势和外部机会，减少或消除院系的外来威胁，弥补组织的主要劣势。院系运用标杆法，可以将自身的发展状态与其他学校的标杆院系进行横向比较，寻找差距，自我改进。标杆法的关键在于找到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的院系，包括卓越领先和同等水平的两类标杆院系。院系与卓越领先者相比寻找差距，与同等水平者相比发挥优势，通过连续学习和改进，达到超越领先者、甩开并行者的目的。院系制定战略计划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无论运用哪一种方

法，都需要对院系内外部关键信息进行深度采集。院系发展的内外部信息既包括各类排行榜（尤其是学科排行），也包括院系办学关键指标的正常运行数据。院系应与学校规划部门保持定期、常态的交流互动，以获取此类相关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院系制定战略计划除了收集相关基础数据之外，对于标杆对象的典型做法、办学经验和路径等信息也要予以关注。只有在数据分析和经验总结相结合的基础之上，院系才能科学地确认战略重点。由此，战略计划确定了院系中期的发展方向重点和任务，通过科学的战略布局来兑现战略承诺，是支撑和兑现战略承诺、保证后续具体战略行动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

（三）战略行动

战略行动是院系制定与采用的具体行动方案，主要解决“石头具体怎么摸”的问题。院系战略发展规划不能仅仅为师生员工描绘美好的希望，还要为实现希望铺就出路。院系只有有效地策划和推进一系列重大行动，发展战略才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院系战略行动是策略驱动型战略，包括与战略计划相关的具体推进手段和实现方式，涵盖如人才引进计划、生源提升计划、科研绩效任务等方面，需要事前制定主动和理性的行动方案。由于当前外部问责机制的强化，战略行动的核心要在与竞争对手的策略对抗中表现出速度和创新性。战略行动可以以年度为时间单位分解目标任务，形成任务清单，明确主体责任，以行动有效性为准则，对责任主体、目标、策略和主要推进手段等进行规划安排，同时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组织结构，与绩效管理相衔接，从而加强执行力，保证战略重点，推动战略实施。

四、制定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保障

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是院系实现转型发展和内涵提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现实环境中，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往往与实际办学情况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足以说明战略发展规划不是自发形成、一劳永逸的。战略发展规划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多重观点的冲突和不同利益的调和，甚至存在抵制变革的声浪。如果没有合理的治理机制、锐意进取的领导者、合作的组织文化来保驾护航，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将面临四顾茫然、无以为继的困境。

（一）完善校院二级治理结构

二级院系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制定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密切相关。“善治”的治理结构和高质量的治理水平，既是制定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愿景，更是必要的条件支撑。中国大学院系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建立新型校院关系和完善二级院系内部治理结构两大要务。从校院关系

看，学校在传统管理关系中经常扮演强势的“婆婆”角色，院系则是相对弱勢的“小媳妇”，这也是为什么以往战略发展规划的主体是学校 and 行政职能部门，而自主求发展的院系战略发展规划位处边缘。没有现代化的校院治理结构，院系得不到学校相应的授权，在人、财、物等方面无法享受必要的办学自主权，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要制定好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就要处理好大学与二级院系的关系：一是实现管理中心下移，赋权于院系；二是改变过度直线的职能结构，实现一定程度的校院结构扁平化；三是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多做服务支持。由此，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才能贴近院系办学的实际，同时降低学校的决策风险。从二级院系内部治理结构看，战略发展规划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合理配置内部的权力和资源。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是否贯彻好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好教授委员会在学术治理上的影响，落实好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和监督的作用，都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效果。概言之，制定二级院系战略发展规划需要学校和职能部门下放治理权、教授委员会行使学院学术决策权、院长行使执行权、学校党政领导集体及全体教职员行使监督权等方面做好相应的机制安排。

（二）提升院长的战略领导力

首先，院长是院系制定战略规划的第一负责人。院长是院系业务发展的掌舵者，是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组织发展的定位拥有更为准确的方向感。在起草战略发展规划文本时，战略发展规划的文本最理想的状态是由院长执笔，或者由熟知院系总体情况的中层起草，而非推诿给行政办公人员代笔。战略发展规划出台过程中，院长需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既要与学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保持沟通联系，还应积极听取教职员工的意见，争取共识、获得认同。再者，尤为关键的是，院长推动院系发展时要着力发挥自身的战略领导力。“制定战略规划是必需的，如果没有战略规划，哪怕某个院长在任期中有积极的、卓有成效的表现，但从学院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不过是碌碌无为的进程中的一段昙花一现般的插曲而已”。这意味着，院长的角色不能简单定位于管理者，而应该实现向领导者的转型。管理者照章办事，领导者引领创新；管理者维持现状，领导者力求发展；管理者依赖控制，领导者激发信任；管理者把事做正确，领导者做正确的事。院长的领导力是愿景规划型领导力，它能够设计一个现实、可信、有吸引力的前景目标，鼓舞教职员员工的热情，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向他们清晰明确地指出，这种目标建立在当前条件基础上，只要经过共同体成员的

努力就会实现。院长的领导力还是变革型领导力(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追随者的需要与希望与院长和系主任对未来发展的理解之间发生着微妙的互动, 从而发挥出一种集合激励作用。院长创造、生发出一种让教职员工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机制, 根据员工队伍的关键价值观来选择特定的发展方向和愿景, 并创造出能够为之提供支持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意义上, 具有战略领导力的院长是散播希望的人。

(三) 创建学习型的战略规划文化

组织文化是影响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无形却又实在的力量。院系组织文化是院系成员共有的一套意义共享的体系, 规范着教职工的态度和行为。院系组织文化既受到所在学校文化的影响, 也弥散着学科文化的气息, 同时在院系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衍生的亚文化。院系组织文化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成为主动应对变革的动力, 也可能成为被动抵制变革的阻力。当组织文化以进取、合作、共商为主流时, 组织文化会成为制定和落实院系战略发展规划的助力。而组织的共享价值观与院系的使命和愿景要求不一致, 它就会成为组织发展的束缚。现实语境中, 院系往往存在结构惰性和群体惰性, 制定院系战略发展规划往往会遭遇各种僵局, 需要在困难中劈波破浪。面对阻碍变革的声音, 院系如果要推动战略发展规划、顺利度过艰难实施阶段, 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战略规划文化”。院系战略发展规划是一项需要习得的技能, 没人天生就理解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性, 就知道如何制定战略发展规划, 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战略规划文化的核心是组织学习的能力, 具备战略规划文化的院系必定是学习型组织。具备学习型组织特质的院系, 院系内部通过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过程, 能够形成一个大家认同的共同愿景; 在解决问题和从事工作时, 共同体成员愿意摒弃旧有的思维方式和常规程序; 成员们能够对院系的整体过程、活动、功能以及与环境的作用进行系统思考; 成员之间能坦率地相互沟通, 不必担心受到批评或惩罚; 共同体成员能够摒弃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 为实现院系的共同愿景一起工作。

(作者: 洪志忠,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百家争鸣】

聚焦！高校“十四五”规划：识变、应变、聚变、求变

为助力高校准确深入理解“十四五”规划新部署、新要求，做好“十四五”时期教育领域改革发展的开篇布局，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于11月29日-12月5日在北京举办第二期“高校‘十四五’规划专题培训班”，10位专家学者，三十多家院校单位和企业代表，共同聚焦探讨高校“十四五”规划新思路、新举措，在识变、应变、聚变、求变中面对新形势、树立新思维、开辟新篇章。

识变高校“十四五”规划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督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从坚定办学方向、把握重点形成合力、构筑教育体系基础、适应新发展格局、深度参与创新发展、着力补齐短板、创新规范服务业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要求，为高校做好“十四五”规划指明了重点方向。”

“高校‘十四五’规划要从大局着眼，要注重世界范围内的新挑战，要响应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表示，党和国家已经把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高度，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要求教育改革创新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工业化向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数智化文明必然要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技术的体系化转变。”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指出，“与工业化文明相比，数智化文明必然要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技术的体系化转变。这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所有这些新的革命性变革汇流起来所推动的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迁。”

就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书国指出，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国际通行的普及化阶段。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将改变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源进入高层次开发阶段。后普及教育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以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为目标，持续扩展需求空间、人口空间、结构空间、国际空间、质量空间、文化空间，实现以质图强，建成世界级高等教育强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就教育内涵发生的深刻变革，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马陆亭表示，要结合“十四五”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背景，深入研究重大战略和政策中的“新发展格局”，充分认识到大学的面向方向和发展方向已经开始调整。高等教育发展要面向新发展格局，要在国家需求中寻找方位。高等教育要以体系建设为龙头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时代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应变高校“十四五”规划

“学校必须树立数字化转型的思维，学校必须建立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领导机制，学校必须把对数字化的投资放在重要位置。”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指出，数智化科技既是当前阶段具有引领性、贯穿性意义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下一阶段科技革命深化的基础性平台。高等院校必须建设一个以人的学习和创新为核心的新的体系。终身学习和创新，是新科技创新的基本要求，是新的大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新的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的价值中枢。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马陆亭认为，办学和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永恒主题。办学即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走出“象牙塔”，学习借鉴世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研究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走出特色之路。育人即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解读“一流本科教育”的丰富内涵，认识到变化才是未来的常态，要紧密围绕“培养能力”这一关键任务。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启动并且正在进入‘理论指导型发展模式’新时期，高校规划要坚持‘研制’而非‘编制’，要坚持培养高校工作者的研究意识和能力。”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教授认为，应用型高校规划建设发展的新重点包括“双高双师双能双智”四双结构型师资队伍建设；“校、院、专业、课程”四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运行；对标合格、审核评估、专业认证、“双一流”指标体系等四个方面高水准、持续建设问题；规模、速度、结构、质量、安全、效益六个方面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何以新的理念、思路、方法做好高校“十四五”规划，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原校长娄源功提出，应用型高校战略规划包含四个模块，第一模块为明确战略规划与愿景。第二模块为掌握教育市场怎么看。要分析“客户”，即学生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并对标学习榜样和竞争对手。第三模块为业务设计要清楚。要明确人才培养、科学发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大使命。第四模块为业务创新要聚焦点。人才培养创新是应用型高校创新的重点、难点。

聚变高校“十四五”规划

蓬勃兴起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得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向有机的整体，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强调，“面向未来的教育要将产教融合核心机制与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相结合，形成以需求为牵引、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教育变革合力。”

以国家和区域需求为导向，高质量做好高校规划，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特聘专家、重庆市教委原副主任牟延林提出高校“十四五”规划的十个维度：新的办学型态理念、新的学习者培育目标、新的课程观、新的教师结构、新的专业布局、新的学科选择、新的资源汇集、新的制度设计、新的评价体系、新的大学贡献。牟延林认为，高校规划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新型评价体系，包括对学生成长治理的评价，对教师能力素养提升及贡献度的评价，对课程、专业、学科的评价，对学校合格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认证等现实型态的评价、对学校未来发展的评价等多维度综合评价。

对新基建和产教融合如何共生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董传仪表示，产教融合是未来教育的重大突破口。产教融合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增长极，拉动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基建对中国产教融合的创新发展无异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教育科技大革命。产教融合的发展，要深入促进5G专业、大数据专业、工业物联网专业、人工智能专业、地铁市轨专业、特高压专业、新能源专业的设立和发展。

求变高校“十四五”规划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表示，我国已处于教育-学习资源的“战国时代”，需求方愈加关注学习行为的目的性和有用性，供给方愈加注重精准定位、量身定制、厘清服务属性。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分类发展、内涵建设阶段，高校多方位校际（学科间）战略合作结盟正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要充分发挥外部需求推动和内部利益驱动两大动力，坚持走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道路。

面向新时代，做好高校“十四五”规划，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特聘专家、重庆市教委原副主任牟延林提出“面向‘十四五’高校规划编制的十二大愿景：**提升学校的办学理念；选择准确的规划定位；争取适宜的环境友好；汇聚可能的办学资源；完善现有的制度设计；实践育人为本的课程体系；探索专业改革的产业学院；服务行业需求的学科选择；梳理紧缺的规划项目；改革教师的评价标准；培育新型的中国学生；实现大学的规划价值。**

在应用型高校“专业为王”时代的新要求背景下，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教授提出，**应用型高校专业内涵建设的新体系涉及内容包括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六个重要方面。**应用型高校专业集群建设的新战略要从建设理念、专业组和本质的本质、建设模式、设置原则、建构策略、“群主”为王、布局形态、建设规模八个方面探索专业集群建设在生成、组织、管理、运行、保障方面的机制创新。

“规划是国之重器。”就如何“把握数智化发展规律，推动‘十四五’规划变革”，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创新发展处处长刘志敏指出，决策要有“数”，治理要有“据”。从决策变革开始，引领数智时代的高校治理变革，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治理新模式，促进架构变革，激发专家、用户、技术和资源聚变反应，实现人机协同赋能高校治理。知识创新工程愿景是提高治理效率，呈现人性化、场景化、价值化的趋势，实现高校从区域知识中心到区域智慧中心的高维跃迁。

（来源：教育部规划中心，教育之弦公众号，2020年，12月8日。）

笔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文件。

《总体方案》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问题，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四个评价”新理念。9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暨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座谈会上十余位专家围绕学习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精神，针对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痛点难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马陆亭：加强高等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探索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是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内容。教育评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是教育进入全面普及时期能否健康前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具有特殊意义。既是思想，更是方法。

1. “五唯”具有发展阶段特征。“五唯”的形成起于数量、成于刚性、错在单一。应该看到，分数、学历、论文等可量化指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表面公平、操作简单，否则也不会累积成顽瘴痼疾难题。在精英教育时期构不成社会问题，而且让人信服，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问题逐渐凸显，是典型的阶段性问题。

2. 破“五唯”就是要实现从“一”到“多”的“立”。“五唯”错在“唯”字上，错在偏激、过分。破“五唯”改革其实就是以量化指标为基础，找非量化点突破，以此逐步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评价体系。即数量指标是基础，“不唯”是扩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3. 抓住核心内涵进行评价。“本质内涵、多元评价”是趋势，内涵是什么就评什么，“多”的地方不再刚性。内涵式发展即按本质属性发展，如每所高校都要实现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但侧重不同。

4. 架构高等学校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什么在教育领域提出的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我们可以将我国高校分为三大类：理论型、实践型和职业型。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各种类型高校之间有可能会产生“光谱地带”，

但方向导向还是需要明确的。教育模式的改革方向是理论型高校要明显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实践型高校要加强综合应用能力训练，职业型高校要侧重动手操作能力训练。各自的教学安排即课堂理论、综合训练、实践操作的学时比例不同。以此作为三类高校的分野，而不是唯层次。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共同遵循。

5. 探索增值评价。增值评价是对评价对象的进步幅度进行测评的一种评价方法，改变了过去学校评价重投入轻过程、重选拔轻培养的倾向，转向更加注重教育过程，探索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评价改革。

6.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重要的是智能自适应教育的应用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智能自适应教育可使每位学生拥有自己独有的学习路径，能有效解决教育规模化与个性化的矛盾，实现规模化的个性教育；区块链技术具有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将对各级各类考试、各种学历学位证书的记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王小梅：一流大学更要培养一流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编审）

目前，正逢首批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期检查刚刚结束。在周期总结报告中，各校对建设成绩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专家的评议意见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有的高校的周期总结报告指出，“双一流”建设以来，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持续领跑、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形成、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一流科研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树立典范、一流大学文化固本铸魂、一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度拓展、一流的制度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这里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是“加快形成”，与其他的“持续领跑”“成绩斐然”“树立典范”“突破性进展”相比，是不是分量不够重？底气不够足？当然，我们不排除人才培养是一个隐性、滞后的过程，即使投入很大也很难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有专家认为，一流人才是在社会实践和科研工作实践中历练成长的，但这不能排除学校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之重器，是国家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承担着一流人才培养的时代重任。“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更加倾心用力培养一流人才，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堪当时代大任的青年学生。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当前，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科学知识和优秀拔尖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大学发展到今天，承载的使命和责任越来越多。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是大学的初心和教育的本质。“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培养一流人才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谋划和把握“双一流”建设大方向，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工作。

“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高校相比有更浓郁的科研氛围、更强的学科实力。一方面我们要引导教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旨趣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社会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更加鼓励和引导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优势快速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转化为培育高层次一流人才的优势，要全面提升一流人才培养能力，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聚焦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为导向，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统筹一流学科、一流师资、一流平台等资源，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人才，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和推进科技创新作出贡献。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代表，“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把培养国家战略紧缺人才当作责任与使命。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一流学科领域的科研项目。为培养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拔尖人才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中要更加强化“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可以说，培养、拥有一流人才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综观当今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无不把培养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流人才作为核心办学理念。在“双一流”评价中我们要探索把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与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一流人才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研究办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在人才培养上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有定力、定心，力

戒浮躁、不折腾，脚踏实地、守望教育、静待花开。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一流人才、孕育一流成果、做出一流贡献”的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力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源源不断的一流人才。

刘复兴：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新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新时代我们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与建设教育强国，教育改革创新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和新的历史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改革创新中具有关键的、前瞻性、引领的地位，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新时代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教育评价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改革为方法论原则，把握好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新要求。

一是教育评价改革要树立新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教育“九个坚持”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确立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政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的“四为”方针，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针。党和国家陆续提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如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培养党的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施劳动教育等。新时代党和国家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是教育改革创新的新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必须遵循教育“九个坚持”，贯彻“四为”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党和国家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作为新标准。

二是教育评价改革要面向新问题。近代以来，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我们开始逐步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成为过去近三百年来我国知识传播的基本特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进程大大加快了，范围大大拓宽了，并且某种意义上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智力支撑。今天我们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遭受逆转，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等成为常态。科技竞争与文明冲突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主要依靠西学东渐已不可能支撑我们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我国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本土创新。教育是创新的沃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如何大力促进培养创新人才？如何鼓励和扶持中国本土科技创新？如何实现中国本土创新与西学东

渐之间的平衡，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必须要面向的新问题。

三是教育评价改革要完成新任务。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的。自然科学承担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人与社会、改造人与社会的重任。自然科学往往是价值无涉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承担着建构一个国家民族价值体系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任务，是一类与自然科学相比很不同的知识体系，是与文明、思想、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息息相关的，也是因文明而不同、因民族而不同甚至是因国家而不同的。在新时代，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具备领先世界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不仅要有领先世界的自然科学技术，还要具有引领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教育，主要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生产与创造知识体系的重任。如何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难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新任务。

四是教育评价改革要确立新主体。传统上，我国的教育评价十分注重教育的结果评价、学科教学的评价和科学研究的评价，而且许多的评价活动是以内部评价为主。教育评价的主体与内容相对是比较狭窄的、单一的。这种倾向也是导致出现“五唯”现象的原因之一。新时代，我们要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就必须拓宽教育评价的主体和内容。要重视外部评价、社会评价与学生评价，加强受教育者在教育评价中的地位；要特别突出人才培养评价的重要性，切实建立健全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系统研究与建立软性指标的评价机制，补足在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评价方面的短板；要注重发展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是教育评价改革要利用新技术。新时代是一个未来已来、将至已至的时代，以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科学等众多前沿科技创新叠加发展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技术变革正在决定与改变着社会结构，不断变革的社会结构又要求教育结构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教育结构是以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为物质和技术基础，嵌入万物互联的社会结构，是万物互联的组成部分。教育的形态由工业时代的教育转变为信息化教育、算法教育、互联网+教育、物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区块链+教育；教育制度体系由金字塔状的以正式制度、刚性制度、等级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转变为立体的甚至是一种边际不断扩展的球状的多回路、网络式由正式制度

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的弹性制度体系。新时代教育评价必须前瞻性地适应这种教育结构体系的变革，充分利用 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构建科学的高效的评价制度。

六是教育评价改革要明确新路径。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化进程遭受逆转的现状，我们绝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评价改革，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我国教育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强教育评价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持续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特别要加强“一带一路”方向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注重构建“N-1”多边合作交流机制。在后疫情时代有效恢复与开展与疫情控制良好的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周光礼：大学评价必须超越指标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双一流”建设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作为国家“千亿工程”，“双一流”建设需要进行社会问责与项目评估，需要寻找国际可比指标。因为脱离国际标准另搞一套，是永远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从逻辑上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学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如何衡量一所大学的办学成绩，如何确定中国大学在世界的坐标，如何评判“双一流”建设成效，教育评价这把尺子至关重要。长久以来，中国大学始终被缺乏合理、准确、系统的评价标准所困扰，各种国内外的商业机构高举量化评价的大旗，以文献计量方法建构各种“洋标准”“洋指标”“洋名次”，给中国大学乃至全球大学产生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实际上，一切教育评价都是主观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世界大学排名的特点和弊端。

1. 重规模，轻质量。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大学规模和数量指标，轻视大学内涵和质量指标。无论是 ESI、U.S. News 还是 THE、QS，无一例外都重视大学组织的规模和整体水平，对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效率关注不够。这些世界大学排名均强调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大学学科齐全，这实质上是一种“以数量取代质量”的不良倾向。作为发达国家话语权的载体，世界大学排名推动了西方大学概念的全球扩散。这些大学排名奉行一套西方研究型大学的逻辑：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需要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必须坚持 3A 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这种大学逻辑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导向下，迅速向全球扩散，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标准”。其实，这只不过是西方精英大学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中

国传统的大学概念与这种大学逻辑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大学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重视立德树人的人文主义教育，二是强调教育与政治交叉融合。过于强调这种“国际标准”容易导致全球大学趋同化，不利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利于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2. 重投入，轻产出。由于大学办学质量难以测量，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流行用投入指标代替产出指标，最荒谬的是用生源质量代替毕业质量，用高考分数代替人才培养质量。其背后的逻辑是：投入多，有质量；投入少，没质量。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中国大学评价高度关注生师比、生均图书资料、生均校园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办学经费等，其结果是把中国大学导向“成本最大化”的办学路径。其实，成本最大不意味着办学质量最高，铺张浪费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值得指出的是，投入指标只能反映大学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资源供应水平，充其量只能决定大学组织的正常运转，只是大学实现卓越的条件。根据大学评价的“柏林原则”，大学评价必须坚持产出导向的原则。也就是说，大学评价指标应尽可能选择产出指标而非投入指标。因为投入指标只能反映大学的一般情况，产出指标才能提供大学声望和质量更为精确的评价。基于此，“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优化结果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3. 重科研，轻教学。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基本上是以科研为导向，科研成果的权重是最大的。其中，ESI 和 U.S. News 只有学术发表一个指标，科研权重占比 100%；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有 5 个指标，与人才培养有关的指标只有一个（占比 10%），科研权重占比 90%；THE 和 QS，科研权重占比超过 60%。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科研成果较人才培养更为显性，容易从量化的数据当中进行排名；二是科研成果的数据获取与处理较为容易，而人才培养指标缺乏国际通用的衡量单位。在这些世界大学排名的导向下，中国“双一流”大学热衷追逐学术 GDP，出现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当前中国“双一流”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与教学不能有效整合共同支撑人才培养，严重背离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大学”。

4. 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科。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几乎都是基于科睿唯安的 Web of Science 和爱思唯尔的 Scopus 数据库，这是两个科研数据库。其中，ESI 根据 SCI、SSCI 论文的分布，将学科分为 22 个。在这 22 个学科中，自然科学占 20.5 个学科，人文社科仅占 1.5

个学科。在自然科学中，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约占一半以上。ESI 以其数据的客观性受到中国一流大学的普遍追捧，以至于在中国高教界衍生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办学理念”，如“没有医学院的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ESI 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可靠标准”。在这种错误导向下，中国大学乃至全球大学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忧思的现象，即大学开始裁撤人文社会学科，因为人文社科对大学排名贡献不大。在我国 140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 40 所大学表示近期要新建医学院。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萎缩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大学的道德领导能力大大弱化，大学已经不能站在道德高度引领社会、批判社会；另一个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目前全球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德育普遍边缘化，大学的组织目标、工作方式、评价体系均不支撑大学德育。

近期“双一流”建设高校自评结果表明，中国已经不缺乏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国际可比指标，许多大学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数据居然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对标大学，欣喜之余纷纷宣布自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社会对此并不认可，这是因为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文化意义上的。所谓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所大学的理念和制度能够给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带来实质性的启示，为其他国家的大学所认同、所模仿。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评价必须超越数量指标，注重大学的精神与灵魂、文化与内涵。

施晓光：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诉求：基于《总体方案》的解读

（北京大学教授）

《深化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政策寓意深远、诉求明确。《总体方案》堪称新时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教育评价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破五唯”顽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指示的具体落实，对我国未来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尤其是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极强的实践引领作用。

1. 《总体方案》充分肯定了教育评价的判断、引领、指导、管理和改进功能，将教育评价改革置于“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以明确。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系统阐述了教育“九个坚持”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新基准和新路径。此次，审议通过《总体方案》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不偏离“九个坚持”的轨道，使之同时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外在需求与学生个体成长的内在需要两种不同的现实诉求，最终实现“社会本位”

与“个人本位”两种教育价值的有机结合。

2. 《总体方案》充分地吸收了中外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教育评价要“遵循教育评价规律（内在逻辑），……以及不同类型教育特点”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这表明：①整个《总体方案》制定的科学依据是充分的，符合“有价值的事物不一定能被测量（评价），而被测量（评价）的事物不一定是有价值的”原理；②其实践基础是丰富的，充分考虑了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力争通过建立科学教育评价体制和机制，实现“管教评”分离，达成“以评促建”，满足教育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实现教育公平的质量性发展。

3. 《总体方案》问题意识突出，着眼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极强的对象指向性。目前，中外教育评价理论流派林立，划分方法形式多样。但本次《总体方案》并没有严格地受限于“教科书”上某一理论和方法的局限，而是立足解决教育及评价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对象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和“健全综合评价”24字工作方针。其目的就是采用“刮骨疗法”，止损“五唯”顽疾。在历史上，“学历文凭”“学术论文”“测验考试”“选拔升学”以及“荣誉称号”等要素指标都在我国教育管理中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把这些要素作为考核指标本身并无大错，问题出在这些要素指标被慢慢异化成“唯一”，背离其设立和使用的初衷。近20余年，“五唯”问题愈加严重，积重难返，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尤其是在“中考”和“高考”考核中，整个社会、学校和家庭多年来早已习惯“唯分数论优劣”“唯升学论质量”。“智育至上”名副其实；追求排名大行其道；英雄学霸备受推崇；在教师管理、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唯文凭论水平”“唯论文论成果”“唯帽子论英雄”的现象屡禁不止，考核过度量化靡然成风……。这些问题对教育事业良性发展造成难以估量损害。应该说，“五唯”标准助长了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是扭曲教育观和人才观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五唯”不破，改革成功无望；顽疾不除，卓越理想难成。当然，破“五唯”并不是全盘否定指标性考核和量化考核的作用，摒弃“五唯”，变教育评价标准的“唯一性”为“多元化”才是目的，乃为教育评价改革任务之重中之重。

4. 《总体方案》中提出的“四种评价”模式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四种评价模式由四组表示程度不同的“动词”加以限定或修饰，体现了《总体方案》的“亮点”和创新。他们既规定了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和制度的评价内容和范围，也明确了未来教育评价的工作重点和任务；既有对过去教育评价工作成果的肯定与反思，也有对未来教育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展望与期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研究，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理论框架奠定

了基础。①《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实际是部分地肯定了这种评价方式，但同时也不掩盖其存在的局限。众所周知，结果评价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模式，作用在于测量教育目标和任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或被完成。从技术角度看，结果评价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结果评价目标和任务的预设的不合理、不科学，那就必然导致结果的“减值”，甚至“负值”。如果像传统教育评价那样将获得知识的多少作为检验学生学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依据，就必然会导致学校教育出现“重智育”“轻德育”“弱体育”“虚美育”“无劳育”的应试教育局面和学生培养中出现“高分低能”“只专不红”严重片面发展的缺陷。②提出“强化”过程评价，既肯定了这种评价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暗喻其实践价值和执行程度远没有达到理想预期。③提出“探索”增值评价，虽然“增值评价”是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评价模式，且逐渐在我国兴起，但增值评价作为舶来品，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本土化移植的方式和成效仍然需要时间检验和不断探究。④提出“健全”综合评价，与单一性评价方式相比，综合评价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仍存在制度缺陷和文化障碍，需不断加以完善。

总之，《总体方案》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好政策。今后的教育评价工作只有很好地学习和贯彻《总体方案》精神，践行“四种评价”方式，实现《总体方案》中提出的“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的改革目标才曙光在前，翘首可待。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

主办：信阳农林学院发展规划处（教研中心）

编辑：叶兆伟 张兰兰

审稿：杨刚

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北环路1号

电话：0376-6686859

邮 编：464000

邮箱：fgc@xyafu.edu.cn
